

論新時期小說中的基督宗教

◎ 楊劍龍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對基督教文化的偏至態度，長期以來人們對基督教文化持有一種批判甚至否定的態度，以致於形成了談教色變不正常的社會氛圍。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學為工農兵服務濃郁的英雄主義語境中，由冰心、許地山、老舍等拓展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濃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便隱沒了。在文化大革命打倒「封、資、修」的「革」文化「命」的狂熱歲月中，基督教文化更是成為受批判遭鄙視的對象。改革開放以後，在向西方開放的過程中，在對於西方文化思潮的熱情關注與引進中，基督教文化也成為一些學者關注的對象，諸多有關基督教神學的著作先後被翻譯進來，各種宗教的活動也逐漸走向正常，這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化與文學的發展。在小說創作中逐漸出現了一些帶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作品：竹林的《地獄與天堂》¹、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²、史鐵生的《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³、《鐘聲》⁴、北村的《施洗的河》⁵、張行健《田野上的教堂》⁶，等等，這使新時期小說創作中呈現出特異的色彩。在這些小說中，或描述在文革年代的磨難中以基督教的信仰獲得心靈的慰藉，或敘寫在歧視宗教的氛圍中對於基督教的反省與決裂，或表現在罪孽深重中對於基督教的皈依而得到拯救，展現出在中國社會世俗化語境中的基督宗教的獨特情境。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摧殘人性慘無人道的時代，它不僅摧殘著人們的肉體，還摧殘著人們的心靈。一切善的、美的事物都被否定了、被打倒了，在醜陋的與美好的事物被徹底顛倒轉換之後，人們的心靈往往失去了平衡，人們企圖保持自我內心的一點清淨與平衡，宗教往往就成為一些人內心對於世俗抗爭的柵欄。丁光訓主教曾經說：「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僅傳教的自由被剝奪了，連崇拜的自由也被剝奪了。」⁷竹林的《地獄與天堂》、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就以主人公對於基督教的依戀，來抗拒動亂的世俗社會的壓抑與摧殘。《地獄與天堂》中的女主人公李寧，她的父母年輕時流落到南洋謀生，父親在當地反華排華的騷亂中被打死，母親努力實現父親的遺願，竭盡全力將女兒送回國。基督徒的母親以基督的話語告誡女兒：「萬能的主教導我們，要愛人，寬恕人。當有人打了你的左臉頰的時候，你要把右邊的臉頰送上去；當有人想要你半件外套的時候，你要把外套脫下來送給他。我的孩子，要記住聖經裏的這些話，這是你回到祖國，在親人的懷抱裏處事做人的規矩，千萬不要忘了。」母親將一個小巧精致的十字架別在了女兒的胸襟上。

回到了祖國的李寧，與年輕的共產黨員革命烈士的後代王燦相戀，各自的信仰之間卻產生了劇烈的衝突。當李寧告訴王燦她信仰基督、並遭到班級裏的同學們批評時，雖然王燦理解地說：「看來你心目中基督就是真善美，你有一顆沉浸在教義中的聖潔的心。」雖然王燦說：「宗教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宗教裏有些道理也體現了勞動人民對美好的東西的嚮往。」但他

卻批評李寧說：「但是，僅僅把耶穌當作偶像來崇拜，讓大家安於自己的命運，那麼，天國的理想是不可能達到的。」他對李寧說：「我是共產黨員，我信奉的是馬列主義。」在王燦的夢境中，出現了耶穌與馬克思的對立與矛盾，在夢中他見到胸前掛著十字架站在上帝身邊的耶穌，他卻想到「耶穌一定也忍受不了人間的邪惡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才逃到天上去的」，當他想去詢問耶穌時，卻來了一個大鬍子老人，對他說：「孩子，不要去找耶穌，他宣傳的是宗教迷信，這是想讓人民永遠當奴隸和受壓迫的麻醉劑，請相信我的革命的理論吧，我的理論是使一切受苦受難的人翻身解放的鑰匙。」基督教的博愛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夢境顯示了主人公王燦內心愛情與信仰之間的劇烈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在無線電研究所工作的李寧受到了衝擊，因為有海外關係，她的宿舍被抄，讓她交代與信仰基督教母親的關係，交代其回國的動機，並讓她親手焚燒了《聖經》、拋開了十字架，李寧以其真誠與刻苦的精神自我改造脫胎換骨。造反派頭頭褚明覬覦她的肉體被拒絕後，褚明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打成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在現實生活的磨難中，李寧徹底否定了基督教寬恕的教義。她在內心中說：「請寬恕我吧，媽媽！——如果現在有人來打我左邊的臉頰，我一定以加倍的力量來還擊他的右邊臉頰；如果現在有人要搶我的外套，我一定要扒下他的外套來！」她被送進了瘋人院，卻責問道：「我瘋了麼？不，我沒有瘋，發瘋的是那些閹割馬列、褻瀆真理的人！」小說中王燦對李寧說：「實現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天堂。當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伊甸園的時候，罪惡的黑手卻在悄悄毀滅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要把人間變成地獄……」小說以一個帶有悲劇性的愛情故事，敘寫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與基督教博愛思想的衝突，在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對於馬列主義的閹割、對於真理的褻瀆針砭中，也一定程度否定針砭了基督教的寬恕思想和天國世界的幻想。

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中的女主人公南珊，她的爺爺楚軒吾原為國民黨國防部高級專員，曾任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代理軍長，1948年淮海戰役中投誠於解放軍，後擔任市政參事參事、市政協委員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受挨鬥。南珊的父母長年流落國外，由於家庭的這種境況，南珊少年時就遭到孩子們的笑罵責打，文革中的倍受歧視凌辱的遭遇，南珊暗暗以基督耶穌作為其內心的安慰與救贖者，在告別爺爺、姥姥帶弟弟登車赴農村插隊時，她告訴爺爺說：「我還應該感謝一個不可測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變成另外一種樣子的時候，使我變成了今天的樣子。這使我非常感激。這力量是偉大而神秘的，有人說，那是一個神聖的意志，有人則說那是一個公正的老人。我更願意相信後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間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並不懷疑我的生命和命運都受過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儘管我不可能見到他，但是我依戀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麼當我終於有一天來到他面前的時候，我一定為我自己，也為他所恩賜給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個兒女的敬意。」顯然是基督的信仰和博愛給了她心靈的慰藉，使她能夠在逆境中忍受磨難，以坦然平靜的心態面對磨難。

作品中還刻畫了一個對南珊有著深深愛慕之意的青年李淮平，他的父親李聚興原任解放軍第五縱隊參謀長，參加了打敗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的淮海戰役，與投誠的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代理軍長楚軒吾有過一段交往。李淮平在文革中就成了抄南珊家的紅衛兵，當他聽到南珊深愛著基督時，他驚呆了：「南珊說的是上帝，上帝啊！基督教，這是個多麼虛幻的神靈！我怎麼能想象，南珊竟會向它去尋找心靈的寄托。這是令我震驚的。一個善良的少女，在她還很年幼的時候，為了給自己的生活樹立穩固的信念，為了使自己的心靈獲得安寧的氣息，她在那古老而荒謬的傳說啟示下為自己創造了，不，是為自己虛構了這座神聖的殿堂和這位仁慈的永

恒主宰。是他創造了她，還是她創造了他，她從此再也不會和任何人去糾辨清楚這混亂的因果。就像人類在上萬年的宗教史中從來也沒有講清楚過一樣。」但是，愛慕著南珊的李淮平內心卻這樣思索：「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儘管在我們的語言中，上帝與魔鬼是同義詞，儘管我從黨那裏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根本否定這個概念的存在，但南珊心中的信仰卻不會使我產生一絲一毫的惡感和虛偽感。這一切在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實的。我好象突然發現，她的心靈越往深處就越廣大得不可思議。在那冰清玉潔的心中，蘊藏著多少豐富的知識，在這些知識的底層，又貫穿著多麼深沉的哲理。而這一切的中心，還有著這樣一座整個人間，乃至整個宇宙都不能容納的金碧輝煌的世界！」在這段話語中，既坦現了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基督教的否定與歧視的觀念，也揭示了李淮平對於南珊信仰的真誠與坦然的感覺。信仰的截然不同，使這兩個年輕人之間有著觀念的距離與情感的鴻溝。

小說以主人公李淮平的視角與心態敘述故事，以李淮平與南珊的幾次相遇交代人物間的交往與情感：早晨在春光明媚的樹林中讀外語時與南珊的初次結識；當紅衛兵抄家時與南珊的邂逅；送朋友去插隊時在火車站聽見南珊與其爺爺的對話；十二年後在泰山上與在省外事局當翻譯的南珊的巧遇。在泰山上巧遇中，任中條山艦航海長的李淮平懷著對南珊深深的歉疚之意，他認為當時的抄家給南珊的家庭帶來了破壞和衝擊，而南珊卻十分寬容，甚至說「在那個時候，當整個社會都被敵視和警惕武裝起來的時候，你們能那樣對待我們一家人，應該說是很難得了」。作品還設計了一位外國軍人波西寧上尉，對待這位崇拜上帝的軍官，南珊卻責問道：「您這樣的軍官大概都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你們卻用手槍打碎了多少無價之寶的腦袋。」而對於宗教十分陌生的李淮平卻告訴波西寧上尉，「在我們的國家中，全部軍官都是共產黨員」。波西寧上尉卻說：「我很高興。我欽佩共產主義者們。我認為你們是人類中另一部分充滿了理想和獻身精神的人。當然，你們相信階級鬥爭的學說，而我們相信倫理與道德的力量。但不同的意識形態不應該妨礙我們互相諒解與合作。那麼，讓我們在和平的事業中為保衛人類文明而攜起手來吧，上帝和馬克思大概都會同意我們這一代不發生衝突。」李淮平卻回答說：「恐怕你低估了我們的戰鬥性。但是儘管階級鬥爭的學說在我們的綱領中根深蒂固，今天我仍然要說，但願如此。」在李淮平的心中，基督與馬克思仍然是勢不兩立的，基督教的博愛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可能得到調和。

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通過南珊與李淮平之間的幾次交往，既控訴了文化大革命對於人們肉體與精神的傷害，也表現了南珊在對基督教的信服中尋求心靈的平靜，又揭示出其在接受了宗教的寬恕精神中對於非人道作為的不滿與憤懣，而在李淮平身上卻體現出其內疚姿態中對於階級鬥爭觀念的執著堅守。

竹林的《地獄與天堂》、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當屬「傷痕小說」的範疇，作品立足於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對於人性人情的摧殘與踐踏，在涉略基督教的信仰時，作家總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予以描寫，又常常主觀地以兩極對立的觀念來看待與描寫基督教的信仰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與衝突，常常顯得過於偏執與主觀，顯示出過往歲月中對於宗教態度懷疑否定的慣性意味。

二

在新時期作家中，史鐵生是一位具有宗教精神的作家，由於其後天殘疾使他常常思考生與死的重大問題，他常常以一種宗教意味的話語解說人生。他說：「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

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⁸他將文學創作的使命視為「探索一條全人類的路」⁹，認為「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¹⁰。在史鐵生的小說創作中，《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鐘聲》是描寫基督教牧師生活的小說，沁出濃郁的宗教的色彩。

《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描述了一位獲得過神學、史學兩項碩士學位的基督教會的主講牧師、如何退出基督教轉而追求馬列主義的經過。詹慶生十四歲上到藥鋪作學徒，由於他勤儉聰慧，為小老板所賞識。他自學了全部中學課程，在情投意合的藥鋪老板女兒白芷的鼓勵下，他決定棄商就學。他在一個機緣中被選進了小教堂的唱詩班，每逢禮拜日照例去小教堂唱詩，後來他竟決心去學神學，並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學的神學院，靠工讀自助拿到了神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一所教堂裏任職。在傳教時他說：「耶穌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救星，在他偉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難眾生都有機會得救，唯逆來順受的宿命論者除外。」卻招來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怒目，甚至懷疑他與共產黨有牽聯。解放後，他開始懷疑有神論，並說：「有神論者都是因為並沒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諦，馬列主義才是苦難眾生的大救星！」他甚至認為宗派幫會只能使人虛偽、狹隘、愚昧，他對基督教作了犀利的批判：認為主是偽善的，主是騙人的，主是愚昧的。他開始信仰馬列主義了，並認為馬列主義是主張科學的，而不是主張迷信的；馬列主義從來只講為人民服務，而絕不要求人民跪倒在其面前「歡呼頌揚」；馬列主義是靠真理來團結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結幫拉派來穩固自己的統治，認為這就是馬列主義偉大於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師於1953年自動退出教會，之後在一所私立小學任教務副主任之職，1955年他又自動辭去了這一工作。「文革」中，他住過牛棚被隔離審查過一年多，後經內查外調確認其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其後他參加了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還從事人防建設。經街道居委會推薦，他當了六年臨時工，負責傳呼電話。他充滿著善心愛心，常常為大伙做好事，常年義務為大家打掃廁所，並不收一點報酬，每天給鄰居老太太取牛奶、倒垃圾，直至其73歲時病逝。

小說通過對於主人公詹牧師從學習神學到退出基督教的過程，既展示了解放以後社會語境對於基督教徒的壓力，也坦現了詹牧師複雜的內心世界。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說：「詹鴻鵠一向是趕潮流的，沒有自己的主見，50年代他退出教會時把宗教貶得一錢不值，後來教會重新恢復活動時他又來祝賀。」可見詹牧師內心並未真正否定宗教。他甚至曾經托人和主講牧師何少光提起要「重新『出山』」，卻被拒絕了，怕他甚麼時候又反戈一擊。詹牧師死後，家人發現在他貼身穿的襯衣兜裏的小塑料包兒中，有兩張照片，一張是全家福，一張是當年獲神學碩士學位時的留影，還有一個鍍金的小十字架。這可以見出在詹牧師的內心深處，仍然沒有徹底放棄基督教的信仰，只不過在特定的語境中他的趕潮流的性格使他脫離了宗教，卻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益處，在他生命歷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基督教對於他的影響但是根深蒂固的。

史鐵生的《鐘聲》以主人公B的口吻敘說了其當牧師的姑父如何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放棄信仰籌建烏托邦式的大樓的故事。B還不到一歲的那年，父母就離開了故土，B跟著爺爺在北方農村的一個鎮子上長到五歲。鎮子上沒有學校，爺爺帶他坐火車到城市裏的姑姑那兒上學。姑姑家住在教堂邊，姑父就在教堂裏當主講牧師。姑父對於新中國的降生特別興奮，他認為上帝所應許的那個樂園正在實現，「一個沒有人奴役人，沒有人挨餓，沒有貧窮，沒有戰爭、罪惡、暴行，甚至沒有仇恨和自私的樂園就要實現了」。他認為上帝把全世界夢寐以求的、把全人類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那個人間天堂最先給了我們的祖國。姑父因此而退出教會放棄了聖職。「姑父說他的信仰已無可挽回地改變：我們為甚麼要向這虛幻的天空呼籲？我們為

甚麼要相信並感恩於那並不存在的上帝？我們千百年來祈望於他的他都置若罔聞。」姑父站在講台上無比激動地說：「現在，並不靠上帝的垂憐和恩賜，一個實實在在的樂園就要建成了！一個沒有貧富貴賤之分的社會已經到來，所有的人都將豐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們千百年來的夢想已經實現！……讓那個無用的上帝安息吧。」退出教會的姑父總是忙於翻來覆去地擺弄一堆圖紙，上大學時學建築的姑父構想建一座上萬人住的大樓，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娛樂廳、公共閱覽室、公共電話間的人間樂園。姑父興致勃勃地對人們說：「這座樓？對，這座樓裏的一切都不分你我，都是大家的。聽我說，你聽我跟你說，你要相信我你就別害怕也別難過，在那個我給你講過的樂園裏，連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大家的孩子，連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大家的父母，所有的歡樂和困難都是大家的歡樂和困難。你聽我說，所有的人都盡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計較報酬，錢已經沒用了，誰需要甚麼自己去拿好了。你聽我說，在那兒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你要是信得過我你就別擔心，那個樂園馬上就要實現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勞動之餘大家就在一起盡情歡樂……」這是大躍進時代共產主義理想的烏托邦式的構想，這種虛擬的世界當然不可能實現的。

姑父退出教會的第二年冬天，教堂就關閉了，後來在一場暴風雨中教堂倒塌了，在大煉鋼鐵的狂熱歲月裏教堂的鐘被人弄去煉鋼，在教堂的地基上造起了一座紅色的居民大樓，與姑父構想的樂園相去甚遠。小說通過主人公的姑父退出教會籌建樂園的過程，既展現了大躍進時代的迷狂和虛幻的時代氛圍，也揭示出社會主義建設時代思想改造過程中對於宗教信仰者的衝擊和影響。談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基督教的狀況時，丁光訓曾經說¹¹：

受衝擊最厲害的是這樣一些基督徒：……他們發現，革命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振奮人心的成果，而基督徒改造中國的設想卻顯得微不足道。這一對比大大動搖了他們對自己從事多年的基督教事業的信心。……作為中國人，他們歡迎解放和改革；但是，作為基督徒，他們該怎樣重估自己的信仰？一大批信徒離開了教會，去參加了他們認為更有力量的組織。

史鐵生的這兩篇小說生動地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基督徒退出教會走向革命的坎坷歷程。

史鐵生的《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鐘聲》帶著「反思小說」的韻味，他從對於歷史的回溯中展示主人公放棄宗教信仰而投入馬克思主義懷抱的過程，在人物尷尬的處境與不幸的經歷中展現主人公這種轉變的無奈與無助，以揭示荒謬年代中的荒謬思維與舉措，從而反思了時代氛圍對於宗教信仰的沉重壓力，以及展示出在這種壓力下基督徒複雜的內心世界。

三

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面向世界努力走向現代化的途中，在制定諸多適應新形勢的政策的过程中，對於宗教的政策也得到了調整，北村的《施洗的河》、張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改革開放以後宗教信仰新的狀況。

北村在1992年皈依基督後，他的創作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用一個基督徒的眼光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¹²，發表了《施洗的河》、《情況》、《張生的婚姻》、《孫權的故事》、《消滅》、《水土不服》等充滿著宗教意味的小說，而長篇小說《施洗的河》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說通過惡貫滿盈主人公劉浪在對於人生價值的追問中皈依基督過程的敘寫，表達出其

「被『逼』向信仰是一種必然結果」的思想。小說中的劉浪原是醫科大學的學生，畢業後他繼承了父親的產業，成為樟板城蛇幫的幫主，在與馬幫幫主馬大的爭強鬥勝中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他殺人越貨、姦淫婦女、販賣煙土，成了一個精神空虛性格冷漠的殘忍之徒，他強迫手下臥在鐵軌下忍受火車在頭頂疾馳而過的驚嚇，他心理變態殺死無辜的婦女，他將為劉家勤懇工作數十年的老花工辭退，他一怒之下將鐘愛的獵犬殺死，作家刻畫了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形象，並突出地描寫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突出人物對於生存價值的追問和探詢。小說沒有著力去寫劉浪在樟板與龍幫頭領馬大的爭鬥，卻著意寫出劉浪在罪惡世界中精神的虛無，對自我生存意義和價值的追問和探詢。小說中無論劉浪多麼頤指氣使隨心所欲，但他的內心始終是空虛的，他對這世界始終是厭倦的，他的精神始終是絕望的，他始終過著一種「死不了與活不成」的生活。他甚至獨自一人居住在與世隔絕安靜空曠的墓穴中，在那裏他獨自為「自己完全沒有意義的生活」而哭泣。然而，躲進墓穴的劉浪仍然拂不去內心的苦痛：

穴居人告別那個世界來到這個地方，充滿了這個時代具有的一切頹廢特徵：龐大、堅硬、空洞和令人窒息。他生活在這裏就像被堵住了喉管，面對空蕩蕩的飄著粉塵的空氣，張著嘴可是無法發出聲音。

小說中執意描寫劉浪內心難以排遣的空虛感、絕望感。

他的惡行已經把他的身體蛀空，剩下一些經過消化的完全無用的糞便和垃圾，充塞著這個空空的軀殼，最後充塞他的大腦，使他的想法趨於荒誕，由垃圾製造出來的思想問道：為甚麼穴居？

為了躲避這個污濁的世界而遷進墓穴的劉浪，處於絕望中憤憤地叩問這個世界：

……為甚麼我不想活又死不了？為甚麼讓我想活又不給我路？為甚麼給我錢財又要讓我飢餓？為甚麼給我房屋又不讓我安居？為甚麼給我眼睛又要給我黑夜？為甚麼不乾脆弄瞎我的眼？

北村執意設計讓惡貫滿盈的劉浪走上皈依基督之路，先設置了從教會中學畢業的醫科大學護理專訓班的女學生天如，她穿著樸素的藍色學生裝，常常帶著《聖經》靜靜捧讀，她常常勸說劉浪「我們都如迷途羊，各人偏行己路」，「你要成為他的羔羊。她說。你要得救」。在這位「神情裏有安慰」的聖潔脫俗的女子面前，劉浪不禁自慚形穢時時檢點自己，他內心深處真正愛上了她，她參加了前線福音醫院的護理隊，劉浪永遠忘不了她。充滿了神性的天如似乎是最初啟迪、導引劉浪走出黑暗的神的天使。小說以劉浪之語說道：「呵。我掉進了一個深淵，這地方淵面黑暗。我知道她要拉我，她已經伸出手來，可是我鉤不著她。」天如在作品中的出現，更多地是一種神性的喻義，昭示著劉浪的走向神性皈依基督的必然。小說設計了一位傳道人的形象，是他將劉浪從水中的淤泥和蘆葦中拉上岸，他對劉浪循循善誘地說了諸多的傳教的話語，終於使劉浪皈依了基督，這位神秘的傳道人似乎是耶穌的化身。施洗後的劉浪身上也溢出濃郁的神性色彩：「他常常在聚集中唱歌，又拿了椅子坐在會所前的草地上，望著整齊的田畝，心情像被一雙手梳洗過一樣清晰。他完全如一只溫順的羔羊，手裏抱著一本聖經，讓陽光臨到身上。」他徹底地變了一個人，安祥平靜、寬容溫順。他可以將滿臉是天花疤痕的醜老太看作是自己的母親，他可以寬恕仇敵執著地向匪首馬大傳教。在他引導馬大去霍童受洗的路上，他坐在船上一邊讀聖經一邊觀風景。北村居然這樣描寫此時的劉浪：

劉浪仿佛活在另一個世界裏，從那個世界裏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裏的樹木和河流，以及覓食的牛和羔羊，從那裏他可以把一切交托，因為萬事都已預備。站在那個地方，他要看見病牛回生、啞巴開口、荒野生長、枯草歌唱。

劉浪已經成為上帝的兒子，遠離了悲哀和痛苦，神跡將在其面前展現，他的身上充滿了神性。

北村以無情之筆淋漓盡致地剖露劉浪身上人性的缺失，在對其自我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的叩問中，突出劉浪的苦痛的內心世界，從而使劉浪走上皈依基督之途，從而表達出北村「沒有神，人活著就沒有意義」的思想¹⁴。

張行健的《田野上的教堂》以牧師布道後神泉村村民們紛紛交納原先拒交的公糧的經過，反映出改革開放後信教的自由與宗教的影響力。仲夏時節兩千多人口的神泉村似乎私下串通好了拒絕交納公糧，年輕的村長杜明林束手無策，找癱瘓了的老支書關子泊求助，關子泊讓他一是盡快張榜公佈往年的賬目，二是在村校的學生娃娃身上做文章。杜明林與老會計整整忙碌了兩天，將全村兩年來的賬目張榜公佈，又請村校校長讓中小學生放假回家動員家人交納公糧，又請了鄉黨委副書記關子池作「交公糧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報告，但是「除了已交來公糧的村幹部、老黨員外，有五十餘戶要求進步或寫過入黨申請書的積極分子和青年團的家戶送來了公糧，絕大多數村民仍在猶豫和觀望之中」。村長杜明林感到走投無路，甚至想到讓派出所強行徵收公糧。村裏從燕京神學院畢業的牧師季春寒回村布道，村民們在聽了季牧師題為《奉獻與奉獻精神》的布道後，紛紛交納了公糧。小說中杜明林的母親和媳婦一貫矛盾重重，卻因為入了教而變得像親母女一般，「杜明林就好奇地想，教會真是個做思想工作的好去處，怪不得神泉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信教，十里八村的鄉親們也紛紛來神泉村教堂這個活動點作朝聖哩」。基督教在神泉村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解決了走投無路的村長面臨的交公糧的難題，避免了一場激烈的矛盾衝突。

小說中刻畫了牧師季春寒的形象。他生於一個基督徒的家庭，因高考落榜深受刺激而右眼瀕臨失明，求醫問藥而不見效果，在聖誕節時他走進教堂聆聽牧師講道、誦唱聖歌後，他的右眼逐漸復明，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並留在教堂裏做一些教會的事情，後來他考入了神學院，全身心地走進耶穌，成了一個敬虔的聖徒。十五年後，他被按立為牧師，遵照老牧師和教會的安排，徒步到幾百里外的山區，赴幾個禮拜聚會點去布道，「幫助信徒豐富聖經知識增強靈性修養，使廣大信徒能及時得到聖靈的喂養與澆灌」，並巡查愛國會的活動情況。他為了教會的工作而拖延了與戀人的婚事，他在奔赴山區布道前對戀人說：「……現在教會處在一個非常時期，老一輩的牧長和廣大兄弟姐妹迫切盼著更多愛主的青年一代教牧同工起來，以神旨為念，以主心為心，以獻身精神來事奉主，以奉獻精神來造福社會，使廣大的信徒能及時得到聖靈的喂養和澆灌，不負主恩……這責任，就托付我了，唯求神恩待我，堅固我，幫助我，扶持我，虹，我人生的目的是甚麼，是牧師——主僕——牧人——人僕，虹，讓我倆一塊奉獻自己吧……」他在神泉村的教堂裏布道的題目就為《奉獻與奉獻精神》，他將奉獻的實質視為「其實奉獻是去除世俗雜念，是驅散貪婪的欲望，是對人生命的一個拓展」，他將基督教的奉獻精神與公糧的交納結合起來，他說：「……令我們深感虧歉的是，主內之人，居然不願向國家和更多的人們交售應交的愛國公糧，愛國良棉，這與奉獻精神實在格格不入哪……一個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都不愛的人，還能談上愛主嗎？」牧師季春寒以其對於基督奉獻精神的遵循與提倡，打動了諸多教民的心，使一場準備動用派出所強行徵糧的衝突得到了化解。

小說中鄉黨委副書記關子池在神泉村的報告，首先談到了關於宗教的問題。他先談到信教人數劇增的原由，認為：

二十世紀的今天，它沒有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消失，相反呢，它卻以愈來愈多的信徒和各種新的形式更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信徒也由過去的愚夫愚婦逐漸知識化、年輕化起來了。為甚麼教堂能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首先我不否認這是一種信仰的力量。但就信教的年輕人來說並不都有這種信仰，他們大多數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抱著現實功利的動機靠近神靈的。……商品市場帶來了競爭，年輕人的心理都有壓力在增加，考學校、蓋房子、娶媳婦、養兒育女、養老送終、各種疾病的折磨，生活的擔子困擾著一大批年輕人、中年人的心靈。在種種壓力下，無論是西方的基督，還是東方的觀音，作個禮拜叩個頭，以求心裏踏實，偶有一次「顯靈」，便信以為真，繼而皈依宗教。

作為鄉黨委副書記的關子池具有政治理論家的素質，他能夠十分辨證地看待宗教的問題。小說中如此描寫關子池的分析：「關子池慢慢分析道：我不否認宗教文化的規範有合理的因素，如講和平、守信義，主張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獻身精神的教育和不殺不姦淫、不偷盜、不妄法的信條，但追求虛無的彼岸世界和來世的永恒幸福是宗教的共性啊，消極出世是其弊病……當前，我們政府還面臨許多問題，我們還無力全部解決農村的教育、住房、婚姻、人口、家庭、衛生、疾病、養老等等問題，還有自然災害帶來的痛苦，要解決只有靠社會的發展去解決，而不能逃避現實，信教去解決……」關子池既肯定了宗教存在的必然與必要，肯定了宗教所具有的合理因素，也指出宗教具有的追求虛無理想、消極出世的弊端。小說中關子池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共產黨人對於宗教的態度，這種辨證的態度顯然比新中國成立之初要明智得多了。

小說通過神泉村在宗教布道影響下順利地交納公糧的境況，展示出改革開放後宗教事業的發展、信徒的增多，並對宗教發展的現狀作了較為深入深刻的分析。1987年3月，丁光訓主教在新德里國際宗教自由會議上的發言中說¹⁵：

今天教會在中國存在，不再依靠外國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優勢，唯有靠信徒用生活和言詞見證福音本身所具有的吸引人的信息和『得眾民的喜愛』。我們三十多年來推進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我國基督教信徒三十六年間從七十萬增加到三四百萬，三自是一重要原因。

指出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宗教信仰逐漸正常化的境況。

北村的《施洗的河》、張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不以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思想對立的視角敘寫故事，也不從反思歷史的眼光構想情節，作品將對於基督教的皈依與信服作為敘寫的主要內容，強調基督教信仰對於拯救人們靈魂的重要作用，強調基督教信仰對於改善人際關係提倡奉獻精神的重要意義。

四

「五四」時期，陳獨秀曾經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中說：「我們不用請教甚麼神學，也不用依賴甚麼教儀，也不用藉重甚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的問題，不但要有覺

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那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污濁坑中救起。」¹⁶在「五四」反傳統的氛圍中，將西方文化引進以拯救祖國啟蒙民眾，在這種時代的語境下，冰心、許地山、廬隱、蘇雪林、郭沫若等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就努力弘揚基督教的博愛、寬恕、犧牲精神，以表達對於封建傳統倫理道德的批判與否定，對於民眾的啟蒙與對於人道的呼喚。

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出現了一些具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小說，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品不同，作家們並沒有鮮明的啟蒙意識，也並不努力弘揚基督的精神，而是生動地展現出基督教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坎坷命運，無論是竹林的《地獄與天堂》、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對於文化革命中的磨難中對於基督的皈依，還是史鐵生的《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鐘聲》對於新成立後牧師放棄宗教信仰的描寫，抑或是北村的《施洗的河》、張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對於基督信仰力量的推崇與禮贊，都生動地展示出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的曲折與沉浮，賡續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基督教文化在文學中表現的傳統，使自新中國成立後被割斷的文學脈絡得到了延續。

中國現代作家常常接受《聖經》的影響，在小說創作中或借用《聖經》的典故，或模仿《聖經》的敘事，或接境《聖經》的人物，使作品中洋溢著濃郁的基督教色彩。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並不關注作為文學文本的《聖經》的影響，而只是敘寫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當代社會沉浮中的變遷與命運，在反映基督教信徒的命運變化與歷史的嬗變中，將人物的複雜心理態細膩地描寫了出來，塑造了諸如李寧、南珊、詹牧師、B的姑父、劉浪、季春寒等當代基督徒的人物形象，以其各自不同的性格充實了中國當代小說的人物畫廊。

從總體上觀之，中國新時期作家缺乏中國現代作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的學識，他們對於基督教文化的接觸與了解往往是浮光掠影的，他們也常常缺乏《聖經》文本的閱讀與研究的背景，因此在他們的創作中常常過於簡單地看待與描寫基督教文化，或簡單地將基督教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作截然對立的描寫，或將對於基督教的皈依視為拯救世人唯一的出路，思維的單一與絕對也構成了作品構思的簡單化，甚至有時造成對於基督教文化某些方面的曲解。在這些作品中，往往就缺乏現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與深厚，常常在對於基督徒生活的浮光掠影式的敘寫中，缺乏對於人生的深刻啟迪與感悟。

德國作家庫舍爾在談到神學與文學時說¹⁷：

它們要打開對宗教感興趣者的眼睛，讓他們看到，在文學領域實際上可以發現一塊獨創性的語言練習、創造性想象和勇於反省的綠洲。這片綠洲將為那些古老的宗教問題注入新的時代活力。對那些對文學感興趣的人們，它們則可傳遞信息，告訴他們，宗教——不管是基督教、還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肯定的、還是有爭議的宗教——都一再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永不枯竭的源泉。

宗教與文學歷來有著不可十分密切的關係，在當代文學的創作中，作家們必須努力去開拓與耕耘這片綠洲，為宗教與文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 1 竹林：〈地獄與天堂〉，《芙蓉》，1980年第4期。
- 2 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十月》，1981年第1期。
- 3、4 史鐵生：《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鐘聲》，見《史鐵生作品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5 北村：〈施洗的河〉，《花城》，1993年第3期。
- 6 張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山西文學》，1995年第9期。
- 7、11、15 《丁光訓文集》（上海：譯林出版社，1998），頁60、91-92、65-66。
- 8 史鐵生：〈我與地壇〉，《上海文學》，1991年第1期。
- 9 史鐵生：〈答自己問〉，《作家》，1988年第1期。
- 10 史鐵生：〈自言自語〉，《作家》，1988年第4期。
- 12、14 北村：〈我與文學的衝突〉，《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4期。
- 13 見林舟：〈苦難的書寫與意義的探詢〉，《花城》，1996年第6期。
- 16 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第7卷第3號。
- 17 昆伯爾（Hans Kung）等著，徐菲、刁承俊譯：《神學與當代文藝思想》（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55。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四期 2003年5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四期（2003年5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